

供给侧改革

理论、实践与思考

贾 康 主编

聚焦新供给经济学

供给侧：创造新需求 引领新常态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供给侧改革

理论、实践与思考

贾 康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供给侧改革：理论、实践与思考 / 贾康主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146 - 0

I. ①供… II. ①贾…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改
革—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14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供给侧改革：理论、实践与思考

贾康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146 - 0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1 3/4

定价：98.00 元

序言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内涵与主要着力点

贾 康*

基于十八大后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结合协调、绿色、开放发展而归宿于共享发展的系统化的现代发展理念，随后，决策层十分清晰地表述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背景之下，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化和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建议的指导文件的发表，又给予我们更多的研究激励和改革、转型的紧迫感。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习近平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对接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

本书概要性地体现了近几年间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在此愿以序言形式特别强调指出和简略勾画如下几个方面：

* 主编简介参见本书第 650 页。

一、现实生活迫切需要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破”和“立”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经济学研究中已有定义的一对概念。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已被研讨多年，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入研究则尤需跟上。有研究界的朋友问：“新供给”新在哪里？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破”，二是新在“立”，三是新在我们成体系的政策主张与思路设计。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说与对策思路框架？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众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们认为，这一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这至少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做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

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我们还直率地批评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 150 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 20 世纪 80 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页岩革命到 3D 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而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其强烈的“供给管理”结构性特征和复杂性特征无法回避。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只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进一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

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做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我们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借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

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总之，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

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基于理论创新认识形成的思路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所应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理应统领全局的“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问题，就是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问题。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以理论创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在这里简介如下。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并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官方意译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其基本的认识视角。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并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⁴；“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第四，柔性参与 TPP 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

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这个“五并重”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八双五并重”所引出的消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的取向，正是对应于十八大以来延续市场化改革取向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转轨、机制优化内涵。

三、供给侧改革发力服务全局：需着力解放思想创新思维

我们所主张的上述这些需“立”的学理与思路建议，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对应于中外古今全球视野实践总结，但又聚焦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现代化可理解

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即服务于中国和世界人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思想解放、思维创新的空间并未充分打开，反而往往容易处处设限。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浮躁化。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研讨清楚了“真问题”，“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处处去分辨是左是右、姓资姓社。新供给研究的追求，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理论学说做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我们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意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绝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线，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今后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 2.0 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共同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解放思想、创新思维，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目 录

第一篇 基本思路与建言

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 / 3

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改革中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的政策建议 / 37

新供给主义宣言 / 62

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
惠民生的建议 / 69

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时期创新发展思路与建议 / 78

第二篇 从新供给视角看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 101

聚焦金融供给侧改革 服务实体经济新发展 / 105

破解中国直接融资难题 / 113

构建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驱动力

——以新制度供给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拓展市场空间 / 129

中国式去杠杆：利用优先股空中加油 / 147

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土地制度改革的难题破解路径

——基于深圳调研的报告 / 153

加快试点“股田制”

——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 1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供给经济学 / 207

经济“新二元结构”催生四大反常现象 / 224

“混合所有制”辨析 / 228

“法治化”取向下的历史潮流与中国经济社会转轨 / 240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我国收费制度研究 / 247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深化改革 / 258

扩大文化产品有效供给 释放文化消费需求 / 265

第三篇 新供给的基础理论创新探索

供给侧考察：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五维一体化”框架与包容性边界
探讨 / 275

“理性预期失灵”：立论、逻辑梳理及其“供给管理”矫正路径 / 316

“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深化探讨 / 337

垄断竞争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 347

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及重要启示 / 356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经济学 / 360

经济学的“新框架”与“新供给”：创新中的重要联通和“集大成”
境界追求 / 364

第四篇 重大现实问题考察分析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 381

胡焕庸线：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半壁压强型”环境压力与针对性能源、
环境战略策略

——供给管理的重大课题 / 388

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问题

——基于 1962—2013 年全球数据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认识 / 426

论中国优势 / 479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的城镇化 / 498

以“一元化”公共财政支持“市民化”为核心的我国新型城镇化 / 510

“政府价格信号”：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及其化解之道 / 519

论国土开发城乡顶层规划与供给体系的优化提效 / 536

经济“新常态” 股市新起点 / 572

2015 年股市大震荡的透视与反思 / 577

对我国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条件前瞻性的分析认识 / 590

治理雾霾促进环保需充分运用经济手段，破解“两大悖反” / 596

PPP：制度供给创新的正面效应和政府管理构架 / 602

PPP 模式理论阐释及其现实例证 / 610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建设与政策建议 / 637

代跋 为何今天中国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 646

附录 主编及作者简介 / 650

第一篇

基本思路与建言